

王朗超 著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 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關於黨的產生以及對黨的性質
問題上若干錯誤認識的批判（修訂本）

西北人民出版社

434

D23

39

王朗超著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 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關於黨的產生以及對黨的性質
問題上若干錯誤認識的批判（修訂本）

西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西安

60757/03

書號：0400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
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修訂本〕

著 者： 王 朗 超
出 版 者： 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西五路138號）
印 刷 者： 西北軍區第一印刷廠
（西安東三路138號）
發 行 者： 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
（西安蓮花坊正新巷3號）

30.001—105,000 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九月修訂厚版
定價：（甲）1,600元

再版的話

這篇文章是爲着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一週年寫的。作爲單行本刊印時，曾根據同志們對原在「羣衆日報」發表的初稿中所提供的意見，作了一些文字上、內容上的修改和補充。在這次再版時，爲了使其內容更加充實、段落更爲清楚起見，除在書中某些地方又作了修改和補充外，並將原書的第五節，改寫爲「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及「關於黨的性質問題上若干錯誤認識的批判」兩節。雖然書中許多缺陷，凡是已經發現的，均已設法訂正，但因筆者知識貧乏，水平甚低，錯誤之處，尙所難免，敬希同志們隨時予以批評和指教。

王朗超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目 錄

一 概 說.....	(一)
二 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三)
三 產生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基礎.....	(一五)
四 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及其最初的發展.....	(二一)
五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二五)
六 關於黨的性質問題上若干錯誤認識的批判.....	(三二)

一 概 說

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中，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作了這樣的概括：「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凡爾賽和約、並且一般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之後。中國的薄弱的工業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時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和工人鬥爭的規模也隨之發展。隨着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在中國革命知識界中間傳播了起來。『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爲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後一

年，共產主義的小組就在上海、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來了。」

喬木同志所寫的這段話裏，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環境，又說明了產生黨的階級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一句話，就是說明了只有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才能產生中國共產黨。

爲什麼中國共產黨只能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不是什麼其它階級的政黨？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這些問題，都是直接接觸到黨的產生、黨的性質的最根本的問題，因而也就是有關於根本上確立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的世界觀、人生觀和革命觀的問題。現在，在我們一部分同志中間，對於上述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並不是十分清楚的，甚至還有許多錯誤的糊塗觀念。本書準備就以上幾個問題，提供一些有關理論方面和歷史方面的材料，以幫助同志們從理論上、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研究黨的產生的階級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並從而加深認識黨，認識黨的性質。

二 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因此，我們在研究黨的產生的階級基礎的時候，就必須首先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生和發展的情況以及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中國工人階級的特點和優點等問題。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曾作了這樣的分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前身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它們是新產生的，它們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階級。它們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構成了新的社會階級。它們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它們是中國舊社會（封建社會）產生的雙生子。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

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毛主席這個正確的分析，是建築在豐富的歷史材料基礎之上的。請看以下的事實：

從一八四〇年英國以武力侵入中國進行了鴉片戰爭起，到一八六一年（咸豐末年）止，這二十年中間，中國本身尚無近代式的大工業機器生產。這時只有英國在香港興辦近代式的工業。同時，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各通商口岸的企業（如航運、銀行、商行等），也隨着它們對中國的侵略而日益發展起來。外國資本家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直接在中國經營企業，於是中國就出現了最早的近代工人階級。

從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前，這三十三年間，大致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大工業機器生產的發端時期（亦即所謂「洋務運動」時期）。這一時期中，前二十年大體上是軍事工業生產的階段。如一八六二年，李鴻章爲了鎮壓太平軍，就在上海設立了製砲局，安慶設立了軍械所，從此，中國就開始出現了近代式的大工業機器生產；一八六五年，李鴻章、曾國藩等又在上海成立了江南造船廠；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成立了船政局；一八七七年在成都成立了四川機器局（即後來的成都兵工廠）。所

有這些，都是滿清王朝所創辦的軍事工業，其目的都是爲了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以維護其反動的統治。此後十三年，中國才有了織布、棉紡、繅絲、開礦、冶鐵等商品工業。如一九〇年官商合辦之上海織布局、開平礦務局（開辦於一八七七年）、黑龍江之漠河金礦、湖北之大冶鐵礦、漢陽鐵廠以及左宗棠統治陝、甘時（一八七八年）所設立的甘肅織呢總局和張之洞總督兩湖時（一八九二年）所設立的湖北繅絲局等，就都是在這一時期中成立起來的。該時期所成立的工業，大都是官辦或官商合辦的工業。而所謂「商」，其實也都是些官僚，資本多是屬於官僚買辦資本的性質。即是完全商辦的，如官僚兼買辦的盛宣懷所發起的華盛紗廠，也還是官僚買辦資本。當然，完全由商人自辦的工廠也還是有的，如商人祝大椿在上海所設立之源昌機器五金廠和廣東商人陳啓源在南海所設立之機器繅絲廠等。但是，像這樣的工廠爲數是很少的。所以，在這一時期中所發展起來的工業，可以說主要是官僚買辦資本的工業，而真正民族資本家的工業只不過才開始露頭。

此外，在整個這一時期中，各帝國主義國家（英、法、德、意等國），也進一步在中國非法地開設和創立了一些企業組織和新式工廠：如英帝國主義所創立之太古輪船公

司（一八六七年）、怡和輪船公司（一八七七年）；法商在上海設立之寶昌繅絲廠（一八七八年）；德人在上海設立之正裕麵粉廠（一八八六年）等等，就都是在一時期創辦起來的。不過，這些企業，一般說來，規模還是不很大的，如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在上海曾收買了的外人在華所辦的最大機器鐵廠，全部資產值銀還不到四萬兩。

由於在整個這一時期中，無論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境內所辦的企業，或洋務運動中封建官僚們所辦的企業，其規模與數量究竟還不是很大的，而私人資本企業的數量也還很少，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一時期的發展也同樣是有着一定限量的。

從甲午戰爭失敗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近二十年的中間，中國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這時期，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從以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尤其在馬關條約訂立之後，各帝國主義依據馬關條約的規定，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和附近城池從事各種工藝製造的特權，紛紛在中國開設工廠，直接經營各種製造業，故一時外商工業在華紛起。此後，凡我國通商口岸，外人設立之工廠均逐年增加，至一九一三年時，在華外商紗廠已有十家，麵粉廠已有十七家，連同其他煙草、食品等工業，總數已達一百六十六家。以後則更有增

無已。同時，各帝國主義又在中國興築鐵路、開辦礦局、成立銀行等，使中國經濟命脈完全爲帝國主義所控制和操縱。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這種對華投資和加緊侵略的結果，又反過來刺激了中國工業的投資，中國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中也得到了初步的發展。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全國紗廠已有三十二家，紗錠在八十萬枚以上。新式繅絲工業已增至四十八家，繅絲機增至一萬三千架。麵粉業也有了初步發展，主要集中於長江中、下游和松花江流域。全國鐵路通車的，在辛亥革命前，官辦的有京漢、京奉等十三綫；商辦的有潮汕、南潯等四綫。其他輕工業以及煤鐵等重工業也有某些發展。隨着外國在華工業和中國本國工業的出現與發展，近代產業工人階級也就出現和發展起來。到一九一二年時，全國職工人數已達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四人，這是一個完全嶄新的階級，是新社會的創造者。但在辛亥革命時，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自己本身的軟弱性，不能担负革命的領導任務，所以，就使革命趨於流產而終歸失敗了。

從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這一時期中，由於在大戰期間歐美帝國主義集中力量從事戰爭，不得不暫時放鬆對中國的侵

略，所以，就使中國民族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在短短的幾年中，全國華商紗廠即由過去的三十二家增至七十三家，紗錠則由八十餘萬枚增至二百一十四萬枚。全國麵粉工業由大戰前的四十多家增至一百二十三家之多。其他如蠶絲、火柴、機器、毛織、水泥、製紙、印刷、電氣、煙草、玻璃、榨油、製糖等工業以及銀行業等也均有了發展，如銀行業即由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家增至一百家左右。由於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也即更加壯大起來。據蘇兆徵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統計，中國產業工人約為二百七十五萬人。若以這將近三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和全國人口作比較，那當然是很少的，但這為數不多的「中國無產階級除了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於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有它的許多特出的優點。」（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以使它在中國革命中能夠成為領導的力量。

中國無產階級有那些特出的優點呢？

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三重壓迫和剝削，而這些壓迫和剝削的嚴重性與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

別的階級都來得特別堅決和徹底。

從陳伯達同志所寫的「中國工業與中國資產階級」一文中所提供的材料來看，過去中國工人一般被剝削的剩餘價值率，大致在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由剩餘價值所轉化的利潤，一部分是被過去反動政府封建式的苛捐雜稅掠奪而去；一部分則被過去工廠管理者的封建官僚式的營私舞弊所掠奪而去。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下，大產業家們和外資競爭並保證其豐厚利潤的手段，就是對工人們的殘酷剝削。這種情形，在抗日戰爭前後表現得更為突出。他們剝削的主要形式是：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和減低工資等。以延長勞動時間說，可以上海為例：上海紡織工人過去每天做工十二小時，而抗日戰爭後則實行所謂「禮拜工」，竟使工人一天勞動十五小時至二十小時之多。這完全是一種強制勞動，嚴重地損害着工人的健康，因而，工人的死亡率逐年增大。再就加強勞動強度來說，以中國紗廠為例：在一九三三年，華廠每萬紗錠須僱工人四四一人，而到一九三五年時，每萬錠僅用二七〇至二八〇人。但當時在華日本紗廠每萬錠僅須一八〇人。這樣，華廠爲了和日廠競爭，就無比的提高工人勞動強度。一九三三年，華廠工人出紗率較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從工人的工資來說，無

論礦工、海員工人、紡織工人等，其工資都是極其低微的，所以，使工人們長期處於艱難困苦、飢寒交迫的生活之中。請看鄧中夏同志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對開採礦工生活所作的描述：「……工人都在包工頭之下作工，因此，工人雖賣勞力，不能與資本家直接交易，中間還須經過包工頭之剝削，如井下工人，礦局所給工資每人每日可合銀洋二角，而包工頭給工人的，則每人每日只可合銅元二十枚（中國兌換市價，銀洋一角可換二十枚至三十枚）。包工頭從工人工資中剝削一半以上。再則發給工資時，又得剝削其尾數，如工資一元以上只給一元，其尾數被扣去，如不上一元者則僅以不足數之銅元付給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誤事罰工資，重利盤剝等事，無所不有。包工頭還公開放賭，工人往往在井下連續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資，不到半日便輸光在賭博場上。不賭又不行，因為包工頭可以借故開除不賭的工人工作。包工頭經常借錢給工人賭博，利息特重，因此每個工人都負債纍纍，無法脫離包工頭的利爪。工人因公致死者卹金二十元，但死馬一匹須損失六十元，所以該礦有「人命一條不如一馬」之謂。其他凌辱打罵，更是不用說了。」礦工如此，其他各業工人的生活情景亦如此。

以上所述，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以及三者相結合對於中國工人階級

進行嚴重壓迫和殘酷剝削的一副悲慘的圖畫。

由於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和剝削，所以，他們的階級覺悟性很高，他們的革命鬥爭性也很強。這些，都具體的突出的表現在他們無數次的英勇的罷工鬥爭之中。

中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是開始得很早的。遠在一九一三年就有漢陽兵工廠工人爲反對以賤價紙幣發給工人工資而舉行的罷工；一九一五年有安源礦工爲反對德國工程師祖護殘酷剝削工人的工頭而舉行的罷工；在歐戰期間，則到處有自發的工人罷工出現；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期間，即有更大規模的工人的愛國罷工。依據不完全的統計，一九一八年全國工人罷工鬥爭爲二十五次，其中有人數記載的是十二次，計參加人數爲六千四百餘人；一九一九年罷工鬥爭則爲六十六次，參加人數十餘萬；一九二〇年罷工鬥爭四十六次，其中有人數記載的是十九次，計參加人數四萬六千多；一九二一年罷工鬥爭四十九次，參加人數十萬零八千左右。這些具體的歷史事實，說明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中國就已經有了初步的工人運動，而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工人階級即開始走上了政治舞台，形成爲一個獨立的力量，爲自身的利益而進行了積極的鬥爭。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也正由於這種高度的集中，所以就使工人

階級更有組織性和紀律性。

中國近代工業雖然很少，但這爲數不多的工業却大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裏，而其生產又大半集中於大的企業之中。比如抗戰前的上海一地，就聚有全國新式工業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而根據我們一種約略的統計，其中有五百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做工的工人，華廠方面，竟佔全體華廠工人百分之五十七稍弱；外廠方面，竟佔全體外廠工人百分之九十六強。又據上海總工會一九二五年的調查統計，上海一地即有產業工人五十萬人，若連同江蘇之無錫、南通等工業地區（這是中國近代工人聚居最多的地區）的工人計算在一起，則共有百萬左右。此外，東北地區約有產業工人六十萬，武漢三鎮合計約有四十萬，天津約三十萬，香港約二十五萬，廣州爲十萬左右，再加上其他各中等城市的數字，全國產業工人的總數約爲三百萬左右。三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集中在這樣少數幾個城市裏，又大多集中於少數大的企業裏，按照上海工業集中的程度，竟超過了二月革命前俄國工業的一般情況，這確是很大的集中。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作工的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在